

〔中国历代文学流派作品选〕

唐宋古文选

◆ 王水照 编选



凤凰出版社

〔中国历代文学流派作品选〕

唐宋古文选

◆ 王水照 编选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古文选 / 王水照编选.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4

(中国历代文学流派作品选)
ISBN 978-7-5506-1258-7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156号

- 书 名 唐宋古文选
编 选 王水照
责 任 编 辑 林日波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邮编:226300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219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258-7
定 价 2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出版说明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代有圣贤著述立言,典籍浩瀚,经史子集四部递相传承。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就集部而言,传承中又有新变,遂创造出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一代之文学”。这些丰富的形式开花结果,传播所及,生根发芽,于是蔚成派系,使中国传统文化园地里呈现出风光各异、生机勃勃的景象。而诗、文、词中的优秀作品便似琼花玉树,撷取并将其赠予亲爱的读者品味欣赏,是我们编辑这套《中国历代文学流派作品选》丛书的初衷。

所谓“文学流派”,《辞海》(第六版缩印本)释义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活动范围内,对文学与现实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艺术志趣相近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组合。”“相近风格的作家可以并不属于同一流派,而同一流派的作家风格又可不尽一致。文学流派的丰富多样是一个时代和一定社会的文化和文学繁荣发展的标志之一。”然就传承方面言之,不拘于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社会,千百年间仍有来者续其流,嗣其响,或同其体裁,或同其主张,或同其身份地位,或仿其艺术风格,或仿创作技巧,不一而足。如,中国古代描写山水的诗歌一路吟诵到魏晋南北朝,在谢灵运的继承和开创下,成为一个深刻影响中国人文性格的诗派。降及唐代,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创作更是将此派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流韵远播后世。又如,边塞诗在汉魏六朝时已萌芽,到盛唐时已成流派。随着国家疆域的开拓,诗歌内容、形式涣然出新,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批作者勃然兴起,他们的作品不仅描绘壮阔苍凉、绚丽多采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及征人离妇惜别思恋之情,思想上有一定深度。又如,豪放词派、婉约词派为宋词两大流派,前者以苏轼、辛弃疾为主要代表,其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上特色鲜明。后者以柳永、李清照为主要代表,词作大都崇尚委婉含蓄地传情达意,表现风格则以旖旎绮丽为主,充分发挥了词“专主情致”的特点。宋室南

渡后,格调出现转折,往往寓含家国之恨、身世之感。两大词派不仅震烁有宋一代词坛,而且深刻影响后来者,由金至清历代不乏学习苏、辛、柳、李者。又如,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文坛中坚推动当时的古文运动,结合着对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辞藻、排偶的骈文文风的变革和对儒学道统的倡复,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成风格,给当时和后世文坛以深远的影响。而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三祖”的清代桐城文派,大讲义理、考据、词章,注重文中的情感和气势。作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写景状物多有传神之笔,描写世情足能令人动容,流传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本套丛书即约请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西华师范大学教授余正松、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忠、武汉大学教授王兆鹏、南京大学教授许结分别对前述流派作品上下纵览,精选细择,探源析流,不落窠臼,编为《山水诗选》、《边塞诗选》、《唐宋古文选》、《豪放词选》、《婉约词选》、《桐城文选》。每书均撰写《前言》,对流派的生成发展、特色、后世影响等进行概述。正文按作者(附小传)、作品、注释、品评四部分依次编排。作者小传包括作者行迹、为官次第及其文学地位、文集存佚等。所选作品以脍炙人口者为首选,并注意在篇目多寡上直观地显现该流派的领军所在。注释涉及地名、人物、掌故、生僻字词、重要异文等等。品评涉及作品本事、史上诸家点评、用字特色、词句赏析、作品内涵等,信息量丰富。作为选本,本套丛书不免有鲁迅先生在《选本》一文中所赞赏和批评的优缺点,如言选本“包罗诸作”,读者能借以“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因而比各家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如言选本固然集中了古人文笔的精华,但读者“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其实这都非重点,有能力、有追求的读者自可依照书中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在选本以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对感兴趣的作家或作品深入了解。重要的是,本套丛书别于当前市面上那些对古人、今人均不负责的粗滥拼凑且令人眼花缭乱的诗、文、词选本,读者当披沙拣金!我们希望本套丛书既能陶冶您的性情,丰富您的精神生活,又能带您完成对历代重要文学流派追源溯流的旅程,领略异彩纷呈的风景。

凤凰出版社

2012年3月

前 言

《唐宋古文选》是唐宋两代优秀的或有代表性的“古文”作品的选集，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作品选丛书”之一种，它又应展示出以“八大家”为中心的“古文运动”的创作业绩，这是本书编选的宗旨。选出优秀“古文”作品和反映“古文运动”历程，这两者既是统一的，但又是有所区别的，因而首先需要辨明“古文”和“古文运动”两个概念与术语的含义。“古文”虽常见于古籍，却有一个逐渐衍化、嬗变的过程，内涵与外延随时而变化，需要用动态的眼光加以把握；“古文运动”始见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领域，已属于现代学术研究范围，虽不乏质疑，却已被普遍接受。

“古文”一词，含义复杂纷繁，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从文字学上来说，一般指如甲骨文、金文、籀文和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经学史上有所谓“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之争，固然是由于两种文本所使用的文字不同，但主要是内容之争）；二是指上古典籍，如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赞》中，使用“古文”一词以指《帝德》、《帝系》二书；三是在文体学上乃指在唐代出现的与六朝以来骈偶文相对举的文章文体，这也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古文”之称，始于韩愈，他用以区别于“俗下文字”之骈俪绮靡，而返之三代两汉之“古”，但他未及对“古文”作更详细的文体界说。第一位从文体学上对“古文”下定义的，是宋代柳开。他在《应责》中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古其理，高其意”是属于内容方面的要求，则容有弹性与损益；“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即散句单行、形式自由，这些形制上的规定，是十分准确到位的。

“古文运动”一词，据目前检索的资料，殆始见于胡适在1927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国语文学史》（次年改名为《白话文学史》，由上海新月书店出



版)。其后,1931年出版的胡云翼《中国文学史》、1932年出版的刘麟生《中国文学史》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3年出版的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都沿用“古文运动”这一提法,并迅速流行于学术界。“运动”是个现代产生的新名词,当年罗家伦把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概括为“五四运动”,准确地抓住其“有组织、有目的而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活动”的特点,可谓名实相符;但发生在千年以前的唐宋“古文革新”或“古文复兴”这一文学现象,并不完全具备现代新名词“运动”的全部内涵,它无非是为了突出这一文学现象已超出个别作家的倡导与实践,而具有相当的群众性和社会影响力,并以一定的理论自觉性为基础的。这仅仅是对“运动”一词在语言运用过程中的沿承和借用,是可被接受与认同的约定俗成。事实上,在学术界也并未引起什么误解。

一 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进程

在唐代以前,我国文章发展史上出现过两个高潮:一是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散文(如《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和诸子散文(如《论语》、《孟子》、《庄子》),以散体文为主;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骈体文充分发挥对偶、辞藻、音律、用典等形式美优长,大大加强了文学的表现力,涌现了一批情文并茂、清新悦目的佳作。但很快出现了流弊,两汉以前那种自由质朴的文章几乎全被骈文所代替,作者们越来越追求声韵对偶的和谐齐整和辞藻的典丽,诚如隋代李谔所批评,“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新奇讹滥,变本加厉。散体文被挤压到议、记等少量应用文狭小的地盘。

随着骈文流弊的日益扩大,文体改革的要求也随之产生。远在西魏,苏绰作《大诰》提倡模仿《尚书》,就是标志之一。到了初唐,一方面沿袭六朝骈文的余风,一方面也开始展现出变革的气象。陈子昂“始变雅正”,和他的诗歌复古主张相呼应,也要求文体的改变。开元之际的文章,大都以散体之气势运偶句,以流行之辞语见自然,成为文章日趋散体化的预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更是韩愈古文运动的直接先驱。萧颖士、李

华等都主张“学经”“载道”，以改变当时衰靡文风。元结的散文在形式上摆脱了骈偶体裁的桎梏，内容充实，他的亭阁山水记、讽刺小品，多有感而作，富有现实性。特别是柳冕文道合一的主张，论说更为鲜明。他认为“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要求文道兼备而又以道为重，已很接近后来韩愈的论点。古文运动的这群先驱者，既为韩、柳古文运动奠定了基础，而其理论上的偏颇和写作实践上的局限，也只能在古文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克服。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唐代古文运动，是借助儒学复古旗帜而推行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在韩愈的古文理论中，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无疑是他理论的核心。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答陈生书》），或换个说法，“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反复强调文道应该兼备，而道又是决定性的。韩愈的“道”在他的理论认识上，主要是指传统的儒家之道，这在其名篇《原道》、《原性》中都有明确的表述。这是因为韩愈面对唐中叶藩镇割据、中央政权实力削弱、社会经济危机深刻发展的局势，需要提倡儒学，以巩固皇权，保持社会稳定；面对佛道两教的炽盛，也需要恢复并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面对其先驱者如柳冕等人的思想资源，更需要接续光大，以增强其号召力与影响力。在韩愈的主观祈愿上，他无疑是既想传道又想传文的，他提出从尧、舜、禹、汤、文、武到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并以“道统”继承者自居，鼓吹先圣先王之“道”；又积极“觝排异端，攘斥佛老”，为复兴儒学扫清道路，他的“卫道”热情应是真诚的。苏轼的两句赞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就是着眼于文道两方面来肯定其历史地位的。

然而，不能由此把韩愈古文运动主要归结为一场恢复儒学的思想运动，目的在于“翼道卫教”。从韩愈的全部活动尤其是写作业绩来考察，他的真正关注点在“文”。他传道之文寥寥数篇，且所见甚浅，尚不能自成一“家”；学“道”路径在思想家们眼中是“倒学”（程颐语），是“以末为本”（朱熹语），本末倒置，有的更直截了当地说是“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韩、柳所言，不过是“门面言道之语”（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他的

“文道合一”论在实际写作中,只是指为文要言之有物,强调“不平则鸣”,并不是把“文”变为传“道”的工具与手段。从当时论争的问题来看,也是事关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问题。如裴度《寄李翱书》:“观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时世之文,多偶对俚句,属缀风云,羈束声韵,为文之病甚矣。”而李翱《答朱载言书》列举“六说”以描述时人“语文章”之异见:“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争论的焦点在于文章之骈散、平奇、难易、深浅等问题。韩、柳等人正是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破解这些写作难题而获得“古文”发展的正确方向的。

所以文体改革论才是韩愈古文运动的精华。他在反对六朝骈文大盛以后的实际流弊中,首先努力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建立起“古文”的新标准:一是“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翱书》),要求语言的新颖;二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要求文句的妥帖和流畅。他还认为这两方面应该是统一的:言贵独创,词必己出,但必须不违背“文从字顺”的语言规律和文风要求;而且应该用这种更新颖更丰富的语言来创造更正确更流畅的新文体,这就不是先秦两汉“古文”的简单还原了。

其次是他的“气盛说”。韩愈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翱书》)骈文在句式、音律乃至辞藻、用典等方面都有固定的要求,从合理的审美追求走向堆垛、板滞,韩愈的“气盛说”可以说从根本上对骈文僵硬体制作了解构。在他看来,作家写作时仿佛有一种力,这种“力”充足了,便会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这就是“气盛”,在这种“气”的基础上才能自由驾驭语言,无论句式、声韵等从笔下自然流出,率意成文,就是绝世妙品,就是最大的表达自由。这正是唐宋古文家获得杰出成就的秘诀所在。

其三,唐代古文运动对文体的革新还表现在体裁方面。它一方面致力于旧体裁的改造和拓展,如在传统序类中别出赠序(韩愈《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杂记类之有山水记(柳宗元《永州八记》);一方面又努力于新体裁的创造,如寓言(柳宗元《三戒》)及寓言式的杂说(韩愈《杂说》)等。以后宋代古文家循此精进,更有多方面的发展。如杂记文中议论说理成分

的加重(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苏轼《石钟山记》);笔记小品的大量涌现,书简、题跋等随笔之作,信手拈来,脱口说出,常于绝不经意中活现一片心境;特别是散文赋的产生(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更为赋的发展开辟新路。这样,终于使唐宋古文达到众体兼备的境地。体裁的革新创造,意味着古文的使用范围、功能和形制的扩展和变化,同时它又与风格、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是同步的,促进了古文文学性的加强和审美价值的提高。

韩愈在文体革新方面切实而明确的主张,配合以杰出创作实绩,通过师承、交游关系的大力宣扬,在古文运动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不仅有“韩门弟子”为中坚,而且同时的欧阳詹、李观、沈亚之等也纷纷从事“古文”的写作。李翱在《韩吏部行状》中说:“自贞元末以至于兹(长庆末),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古文运动已成为一种广泛群众性的社会现象了。柳宗元在其中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热情地培养和指导后进的古文作者,而且以自己的写作成就在士大夫中间树立了新文体的威望,成为仅次于韩愈的核心人物。

唐代古文运动的成就突出却后继乏人,降及五代和宋初,靡丽浮泛的骈文重又统治文坛,由此又引发出以欧阳修、苏轼为先后领袖的宋代古文运动。欧、苏虽直承韩、柳,却又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其重点并不在打击骈文本身,而是致力于文风的改革。宋代古文运动经历过反对浮艳空洞的“五代体”和藻饰丰赡、典重华贵的“西昆体”骈文,又吸取宋初古文简古奥涩、学古不化的失败经验,摒弃僻涩怪诞的“太学体”古文,才奠定了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一宋代散文的群体风格。严格地说,唐代散文尚未形成群体风格。韩愈的刚健雄肆、奥衍宏深,柳宗元的清峻峭刻、简洁凝练,均达于散文艺术的极诣,但从学者未能承响接流而形成强大的风格流派。韩愈的文风实有“难”(奇崛)、“易”(平易)两种,其门下两大弟子李翱、皇甫湜,一得其“易”,一得其“难”,而韩愈自己的主要美学趋向则在“难”的一面。刘熙载《艺概·文概》说:“韩(愈)文出于《孟子》,李习之(翱)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这从历史渊源上指出了宋文平易风格的成因,也揭示出宋文与韩(包括柳)文基本风格的异趣。

当然,宋六家的散文也是各具面目的。如欧阳修、苏辙的纾徐平和、温

醇厚重,苏洵、苏轼的汪洋恣肆、雄健奔放,曾巩的严谨平实、细密峻洁,除王安石以逆折拗劲、斩截有力而深得韩、柳真髓外,其余五家的个体风格实只表现为群体风格基础上的多样性,“平易”始终是他们风格中稳定的共同因素。

南宋的文风也基本上承袭欧、苏的传统。一般说来,南宋散文向加强说理和思辨的方向发展,欧氏的影响似更大些,风格更趋明畅,文字更为醒豁。但像陆游、文天祥、谢翱等爱国志士的文字,雄贍豪迈,挥洒自如,则与苏轼为近。

二 “唐宋八大家”——“古文”的经典化与影响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代韩愈、柳宗元与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这一合称的产生、演化和在广大民间和官方的共同确认,标志着唐宋古文运动的最终成功。“古文”作为一种新型文体的经典化过程及其定型,既表示对这八位古文家写作成就的历史性肯定,也使这一群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崇高的地位,反映出古文运动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

北宋士人已有“韩柳”并称,穆修在《唐柳先生文集后叙》已云:“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到了南宋,最早出现“韩柳欧苏”四家并称。王十朋《读苏文》说:“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吕祖谦《古文关键》开篇即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但此书选文部分为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七家,多出张耒,却无王安石、苏辙,与“八大家”名单有出入,表明“八家”的遴选尚处酝酿阶段。

第一位为八大家文章编辑成集的,是元末明初人朱右,他编有《八先生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其书已佚,但在他的文集《白云稿》中,有《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一文,实际上是八家之文(将苏洵父子三人合为一家)。他在文中云:“有能振起斯道而奋乎百世之下者,独韩文公上接孟氏之绪,而又翼之以柳子厚。至宋庆历,且二百五十年,欧阳子出,始表章韩氏而继响

之，若曾子固、王介甫及苏氏父子，皆一时师友，渊源切偲资益，其所成就，实有出于千百世之上。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这段文字表明，“唐宋八大家”的合称，其时已可谓初步确立。

在传播表彰“八大家”过程中，最重要的选本当推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茅坤在该书自序中，毫不讳言他编辑此书是为了与李梦阳等人立异对阵。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倡导文学复古运动，风靡一时。据《明史·文苑传》所言，他们的主张是“文必秦汉，诗规盛唐”；茅坤在自序中批评他们“湛淫滌滥，而互相剽裂已乎”，企图以这个选本作为纠偏之具。与此同时，唐顺之编有《六家文略》十二卷，所谓“六家”，是指韩、柳、欧、苏氏三父子及王、曾，把苏氏父子三人合为一家，因此，实际上茅坤所选与他完全一致。唐顺之还编有《文编》六十四卷，收录从周代至宋代之文，其中唐宋之文，也以八大家为最（韩 143 篇、柳 67 篇、欧 206 篇、苏轼 199 篇、苏辙 57 篇、王安石 52 篇、苏洵 33 篇、曾巩 25 篇），同样体现出标举“唐宋古文八大家”的目的。

中国文学史家们在论述明代文学时，原有“秦汉派”、“唐宋派”之争，近来学者多有质疑，但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对唐宋古文的推重是无法抹煞的事实。归有光的古文写作成就最大，也呈现出师法唐宋的倾向。尤其是茅坤这部选本作为初学者入门书籍而广为流布，影响深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云：“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明史·茅坤传》亦云：“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应该充分评估茅坤在“唐宋古文八大家”经典化过程中的突出作用。

降及清初，储欣辑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在传统八家外，另增韩愈弟子李翱和三传弟子孙樵。但这个并称并未广为流行，不足以动摇“八大家”的权威地位。在清初，明确标举师法唐宋古文的还有著名的桐城派。桐城派首先是一个学术流派，但从其强调“义理”、“考据”以外，还重视“词章”（或“文章”）而言，则亦可视为一个文派。方苞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竭力缩短程、朱对韩、欧所抱有的距离感，在“道”与“文”之间采取



中庸、折衷的态度。方苞编选的《古文约选》和姚鼐《古文辞类纂》两部著名选本，八大家的文章都占有很大比重。他们还进行“古文”纯正化的努力，为“古文”设置严格的界限。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方苞语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俳巧语”，这一观念又为姚鼐、吴德旋等人所尊奉。用“清真”、“雅洁”等规范的文字来阐发并践行程朱理学，这是桐城派的主旨所在。然而，这势必大大缩小汉语语言宝库，影响文章表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实际写作中也无法遵守这套清规戒律。因而，也有学者主张“古文”实与“散文”同义，古文的第一重义界就是散句单行的“散文”，以与讲究对偶、词藻、音律、用典的骈体文相对举。本书所选“古文”，即采取这一可以容纳多种语言成分、较为宽泛的尺度。

本书得以编成，侯体健、卢康华两君助力为多，特此说明并致谢。

目 录

前 言	(1)
魏 徵	
谏太宗十思疏	(1)
陈子昂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4)
王 维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7)
李 白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9)
李 华	
卜论	(11)
元 结	
右溪记	(15)
韩 愈	
杂说(其四)	(17)
师说	(18)
进学解	(20)
张中丞传后叙	(24)
送孟东野序	(28)
送李愿归盘谷序	(31)
祭十二郎文	(33)
毛颖传	(37)

**白居易**

庐山草堂记 (41)

柳宗元

捕蛇者说 (46)

种树郭橐驼传 (48)

三戒并序 (50)

始得西山宴游记 (53)

钴姆潭西小丘记 (55)

小石潭记 (56)

李商隐

李贺小传 (58)

孙樵

书褒城驿壁 (61)

罗隐

英雄之言 (64)

越妇言 (65)

皮日休

读司马法 (67)

陆龟蒙

野庙碑 (69)

王禹偁

待漏院记 (72)

黄冈竹楼记 (75)

范仲淹

岳阳楼记 (78)

欧阳修

朋党论 (81)

五代史伶官传序 (84)

秋声赋 (86)

泷冈阡表	(87)
醉翁亭记	(92)
与高司谏书	(94)
祭石曼卿文	(98)
苏舜钦	
沧浪亭记	(101)
苏 洵	
六国论	(104)
木假山记	(106)
周敦颐	
爱莲说	(109)
曾 巩	
寄欧阳舍人书	(111)
墨池记	(113)
司马光	
进资治通鉴表	(116)
训俭示康	(119)
王安石	
本朝百年无事劄子	(123)
答司马谏议书	(127)
读孟尝君传	(129)
伤仲永	(130)
游褒禅山记	(131)
沈 括	
活字板	(134)
雁荡山成因	(136)
苏 軾	
赤壁赋	(139)
后赤壁赋	(142)



喜雨亭记	(144)
文与可画筍箐谷偃竹记	(146)
石钟山记	(149)
书蒲永升画后	(152)
答谢民师书	(154)
日喻	(156)
记承天寺夜游	(159)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161)
黄州快哉亭记	(163)
黄庭坚	
江西道院赋并序	(167)
晁补之	
新城游北山记	(172)
李格非	
书洛阳名园记后	(174)
李清照	
金石录后序	(176)
刘子翬	
试梁道士笔	(184)
胡 铨	
上高宗封事	(186)
岳 飞	
五岳祠盟记	(191)
陆 游	
姚平仲小传	(193)
跋李庄简公家书	(195)
朱 熹	
送郭拱辰序	(197)